

地域文化与历史

宗教空间与世俗政治的交汇：
圆明园正觉寺考述

尤 李

(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北京 100084)

〔摘要〕 文章将清代档案材料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成府村志》进行参校推证,考察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内的藏传佛教寺院——正觉寺的陈设、布局和装饰,阐释其宗教内涵,驻庙喇嘛及其佛事活动,并揭示出这座寺庙在处理清廷与蒙藏关系和巩固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圆明园;正觉寺;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4-0050-09

正觉寺位于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之一的绮春园正南部中间,既成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绮春园相通,实为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因其属藏传佛教寺院,又被称为“喇嘛庙”。正觉寺始建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墙院占地1266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

早在20世纪30年代,释妙舟便简要提及圆明园正觉寺的建筑、环境及其变迁^①。在本世纪,学界对这座皇家佛寺进行了专门研究。吴兆波简述了圆明园正觉寺的布局特征、驻庙喇嘛的情况^②。《圆明园百景图志》概括叙述了正觉寺的建筑及陈设、装饰^③。姚庆和孙连娣勾勒出圆明园正觉寺的历史变迁、考古发掘以及其中的天王殿遗址保护的大致轮廓^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指出圆明园的正觉寺属于满族喇嘛寺院,它作为御用寺院,担负着为皇室祈福诵经的任务,并概述了正觉寺喇嘛的级别、职责和寺庙建筑,以

及正觉寺在近代遭受破坏、遗址变迁、修缮和复建过程^⑤。胡译文等探讨过圆明园正觉寺的不同绿地类型对空气负离子的影响^⑥。本文拟进一步探究正觉寺的陈设、布局、装饰和宗教内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分析其政治功能。

一、正觉寺的陈设、布局及装饰

在民国时代,满族画家金勋所撰《成府村志》记述圆明园正觉寺的地理位置和总体环境云:

该寺在北河沿度十步三座桥西行路北。喇嘛庙建于乾隆间,东西北三面均界万春园(即绮春园),前后殿宇到底五层。松柏交加,崇楼飞阁,金碧辉煌,钟磬盈耳,香烟缭绕,冲空荡漾,似云流动。^⑦

〔收稿时间〕2016-03-15

〔作者简介〕尤李(1981-),女,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博士。

① 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第七篇《寺院》,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以民国原刊本作底本,初刊于1935年),第266页。

② 吴兆波《乾隆皇帝与圆明园》,《北京档案》2005年第11期,第49-50页。

③ 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514-519页。

④ 姚庆、孙连娣《圆明园正觉寺天王殿遗址保护初探》,《青春岁月》2013年第19期,第397页。

⑤ 陈庆英、李德成编著《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第三章《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76-179页。

⑥ 胡译文、马履一、贾黎明、李俊清、王小平、鲍凤宇《圆明园正觉寺的不同绿地类型对空气负离子的影响》,《北京园林》2015年第1期,第44-48页。

⑦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614页。

庙宇中均用砖石洒地,留出树池之地。松柏参天,与楼阁掩映。真胜境也。^①

以此观之,正觉寺建于形胜之地,布局严整,建筑精致。而且,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1900年八国联军破坏圆明园之中,正觉寺均未遭受重大毁坏,幸免于难。

关于正觉寺的山门,《成府村志》曰:

其前寺门为三券式歇山顶,内塑哼哈二将,左右角门各一。二层为天王殿,前列铁鼎,左右亦角门二。东西为钟鼓楼,旗杆各一。^②

其中“歇山顶”系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形式的一种,造型精美,结合了直线和斜线,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棱角分明、结构清晰的感觉。“哼哈二将”乃汉族民间对佛寺山门前二金刚的俗称,为佛教中守护庙门的两个神,其形象威武凶恶。在中国传统佛寺建筑中,天王殿通常是山门内的第一重殿,殿内中间供奉弥勒菩萨,面向南;弥勒像后供奉韦陀菩萨,面向北;东西两旁则供奉四大天王(即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照此推测,正觉寺山门第二层的天王殿亦当供奉这些神祇。

进入正觉寺山门之后,从前往后依次分布着三圣殿、文殊阁和最上楼。

《成府村志》对三圣殿的描绘最为细致:

过天王殿北视之为三圣殿。一间代后,抱厦三间,上檐为四大坡庑殿顶,殿前为月台,殿内正中塑楠木雕刻三世佛,均有木刻背光,中为如来,左为毗卢,右为无量寿,均贴金罩漆。东西两山塑上五彩十八罗汉,形象如生。正中挂黄云缎绣花檐,门子堂左右黄檐,四首下角均有铜铃。正中供桌三堂,雕刻西番莲、红漆地儿、金花儿,桌上鼎炉蜡扦花筒俱满。尚有五供儿与八吉祥,为轮、螺、伞、盖、花、罐、鱼、常。神台前有牛油铜海灯一列,约数十盏。殿内东西列经桌各一行,高一尺余,长约三丈,均用黄布桌套。桌下设长椅座位,上铺黄布坐褥。经桌南端有架子、大鼓各一面,一边放着一对木刻龙头鼓锤。经桌上法器之类很

多。有带屋子九音螺一对,大盘凭铃一对,铛子一对,白螺一对,钹铙各一对,喇叭鼓一个,喇叭壶一个,内插孔雀翎儿,之右藏草,人骨笛一对,各大铜喇叭一对,笙管笛一对,小铜铎一对。这都为上殿念经所预备的。^③

三圣殿前东西配殿各五间,殿顶为歇山式,内塑西藏番佛十尊。正殿后抱厦内塑南海大士一尊,生于悬山洞内,站童二人为善财、龙女。^④

其中“抱厦”为一种建筑模式,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围绕厅堂、正屋后面的房屋,在形式上如同搂抱着正屋、厅堂。三圣殿的上檐为“庑殿顶”,而庑殿顶在中国古代各屋顶样式中等级最高。三圣殿内正中供奉着三世佛:如来佛、毗卢佛(即大日如来佛)和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东西两边还塑有十八罗汉,其内部陈设和装饰真可谓富丽堂皇。

三圣殿正中的供桌摆放的“五供”指五种供物:香、花、灯、水、果。此供桌安放的“八吉祥”又称“八瑞相”、“八宝”,指藏传佛教中八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法轮、宝伞、吉祥结(又称“盘长”、“盘常”)、右旋螺、莲花、宝瓶(又称“罐”)、金鱼、宝盖,即《成府村志》所简称的“轮、螺、伞、盖、花、罐、鱼、常”。

另外,三圣殿的正殿后抱厦内塑“南海大士一尊”,此即观世音菩萨。其中“站童二人为善财、龙女”,系观世音菩萨的胁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十二日《和珅等奏销算春雨轩赏趣殿等处园工银两摺》所附之《清单》称:“舍卫城(指圆明园的舍卫城)仁慈殿换下重檐铜鼎炉一件,挪至正觉寺大殿前安设。”^⑤此处的“大殿”可能指三圣殿。

《成府村志》叙述位于正觉寺中心的文殊阁云:

(三圣殿之)再北为双檐八角亭曰文殊阁。亭内神台高六尺,南北长方形,以汉白玉刻成须弥座儿。台上塑一青狮站立,昂首南向,顶上红色嵌珠判悬着五个金铃,正中红色西牛尾,屈胸,腰部披锦绣,左右双垂璎珞、垂珠、金穗子,狮尾部上卷。狮高八尺,身长一丈四尺,周身贴赤金数层,然后在金上刷

①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6页。

②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4页。

③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4-615页。

④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9页。

石膏,用竹签拨石膏,即露出线纹。宜次拨之,成为蓝狮,周身金毛。……狮背上驮一九品莲台,上坐一楠木雕刻文殊菩萨,右腿盘坐,左腿伸下莲台,复由莲台下部上升一枝莲花托着左足,双手在胸前,右手掌向上,左手掌平伸如接礼状态。项下左右披肩,赤背披缨络、垂珠,头带扇云烈焰金冠,身后背光高丈余,光焰中雕刻西番莲十二朵。上部佛像及背光均用赤金包裹,罩退光漆。该像通高三丈,神台上塑站童。东为狮奴,黑面虬髯,面目丑恶,带五色条儿螺螄盔。其服装若西洋回回,右手牵狮项上缰绳。狮之右塑一韦陀,全身甲冑,五彩装金,风带飘扬,威风凛凛,左手捧降魔杵,手掌在胸部,向上升如还礼状。正中供桌为彩漆钩金式样,上陈鼎炉一份,两柱间悬挂黄绢木框对联,为高宗乾隆御笔。该阁外檐菱花坎窗及桶扇一槽。^①

狮子乃藏传佛教中的灵兽,也常常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如《成府村志》所载,文殊阁中的文殊骑狮造像高大、华丽而精美。其中所云“韦陀”即韦陀菩萨,为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神。正中的两柱间还悬挂着清高宗御笔题写的黄绢木框对联,可见高宗对这座寺庙的重视程度。只是该对联的具体内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二十五日《和坤等奏销算方壶胜境等处园工银两摺》所附之《清单》曰:

绮春园内正觉寺殊像阁(即文殊阁)重檐八方亭一座,拆盖,挑换大木、椽望,满换连檐、瓦口,拆安、黏补、装修,归陇阶条石料见新,拆砌槛墙,拆壤地面,油画见新,换湖窗新,换铰博缝,内里狮子一匹,满换木植,请安佛像,找补衣丰,拆安背光、连座,找补莲瓣、花头,以及七珍、八宝装严见新。僧房八座二十二间,内十五间拆瓦头停,大木挑伞拔正,挑换椽子,满换找檐、望板、连檐、瓦口,拆安、黏补、装修。拆砌山、檐、隔断、槛墙,拆壤地面七间,拆瓦头停,挑换椽子,满换找檐、望板、连檐、瓦口,黏补、装修,拘抵山、檐、槛墙,并找补油饰、裱糊等项,销算工料银五千三百五十两四钱一分。^②

这是一份记录乾隆五十七年修缮正觉寺的具体

程序的档案。由此视之,这次修葺较为彻底,一共花费“工料银五千三百五十两四钱一分”,数目不小。而“七珍”和“八宝”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及其陈设常用的装饰,也是其常常供奉的宝物。藏传佛教中的“七珍(即七宝)”为:玉髓(一种石英)、蜜蜡(即密腊,琥珀的一个品种)、砗磲(一种宝石)、珍珠、珊瑚、金和银,又被称为“西方七宝”。“八宝”即八吉祥,前文已有论述。与之类似,清代北京城内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的多数殿堂内的供桌上供奉着木制漆金七珍八宝模型。另外,雍和宫西配殿内悬挂着纸本七珍八宝四条屏,是为绘画中的七珍八宝^③。总而言之,正觉寺文殊阁的陈设和装饰用“神工天巧”来形容亦不为过。

《成府村志》如此描写位于正觉寺最北部的最上楼:

(文殊阁之)再北为最上楼七间,下层正中塑五方佛,身分五色,皆以如来形状,各坐莲台之上。正中明间一尊全身均黄色,东次间一尊为蓝色,东(梢)间一尊全身皆绿色,西次间一尊全身皆红色,西梢间一尊全身均白色,认佛像状手音分之。两尽间皆有木板桥。入小门有楼梯,西板墙有罗汉床一架,昔为张嘉胡土克图坐位。两山间均有经柜,内藏卅体字经文,均为厚纸单页式,两面印字,用挾板挾之,缚以黄带。由东西楼梯皆可到楼上。^④

关于最上楼的“下层正中”所塑之“五方佛”,又称“五智佛”、“五方如来”或“五智如来”,源自密宗金刚界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东南西北中五方各有一佛主持,分别是中央的毗卢遮那佛(俗称“大日如来”)、东方阿閼佛(另说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成府村志》所谓经柜“内藏卅体字经文”,可能指此处藏有藏文书写的佛经。其中“罗汉床”乃古老的汉族家具,属于卧具之一,一般体形较大,又有无束腰和有束腰两种类型。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的,俗称“罗汉肚皮”,故又称“罗汉床”。

“张嘉胡土克图”即章嘉呼图克图,此处当指章嘉·若必多吉,又名章嘉·意希丹贝准美贝桑布,即第三世章嘉活佛(1716—1786),系清代著名藏传佛教

①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312—313页。

③ 马兰、李立祥著《雍和宫》,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221—225页。

④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领袖。章嘉活佛负责管理京城、内蒙古、热河和多伦诺尔的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事务。据研究,章嘉·若必多吉佛学造诣高深,深受清世宗和清高宗的尊崇和礼遇,担任过国师^①。章嘉·若必多吉自8岁进京至70岁圆寂,在皇宫任职60余年,经历雍正、乾隆二朝,他作为“大国师”、清高宗的“同窗密友”,以活佛的领袖地位和政治影响,为巩固清朝与蒙藏的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作出重大贡献^②。

由上引《成府村志》的记录可知:三世章嘉活佛曾经驻锡于圆明园的正觉寺,而且与这座皇家佛寺关系颇深。这就牵涉到一个宏大的政教背景。清朝统治者将蒙藏地方较有影响的一些黄教高僧延请至北京,供给钱粮,赐予庙宇,让他们掌管京城及承德、五台山等地的喇嘛事务,或奉旨赴蒙藏地方办事,称之为“驻京呼图克图”。驻京呼图克图中,又以历辈章嘉呼图克图地位最尊、权势最大。清朝之所以设驻京呼图克图,一方面是想以此体现其尊崇黄教、优礼喇嘛的宗教政策,争取蒙藏地方势力真心归附;另一方面也想通过驻京呼图克图随时了解蒙藏地方的情况,通过这些高僧活佛妥善处理蒙藏地方事务^③。圆明园正觉寺的修建及其运作正是清代实施这项政策的一个实证。

《成府村志》还对最上楼上供奉的偶像进行特写:

这楼(即最上楼)上的神祇木偶,比中国普通佛教徒所膜拜的胎□狰狞可怕得多。他们不但丑陋可怕,赤条条的状态和最惹人憎厌的面貌,表现淫欲交媾的肉感。尚有兽一排、鸟一排、人一排,均是一排一排的压着作淫欲形状。那喇嘛陈列这比二为妖为肖的一群一群的交媾的偶像,显然感觉最大满意。而且对于前面那种观之欲□的状态,似乎还欢目注视矣。^④

这段文字描述最上楼上的“神祇木偶”之“丑陋

可怕”之貌,实即表现密宗菩萨怒目之像。密宗菩萨现怒目身以降伏恶人,正是慈悲、智慧与方便的圆融任运,与凡夫俗子的愤恨之情截然不同。而《成府村志》的作者显然不熟悉密教教义,故使用贬斥之笔法表述最上楼所供奉的密宗菩萨像。

《成府村志》所谓“表现淫欲交媾的肉感”,实系表现喇嘛教的性交之术。在喇嘛教中,性力崇拜盛行,图像中常常出现神与女性配偶性交的样子,喇嘛教神像的作用完全如同房中书的作用,即用以传授性交方法^⑤。如前引《成府村志》所示,最上楼楼上的这些“神祇木偶”其实起着向喇嘛传授性交方法的作用,以至于喇嘛们看着这些偶像,“感觉最大满意”。

实际上,性交在喇嘛教修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清代以前的中原社会,人们对性一直保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房中术原本乃正经的学问、正统的修行方式。满人原本很少有性禁忌,然而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却将与性有关的书画列为禁书。自清代以来,性却成为秘不示人、讳莫如深的东西^⑥。在这种背景之下,民国时代的满人金勋将喇嘛教的性交之术误解为“淫戏”,完全是因为自身带有文化偏见,而并不谙熟喇嘛教的教义及其修行方式。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十八日铸灯处的一份档案记载:

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绮春园新建庙(即正觉寺)后楼(即最上楼)楼上,着金辉成,造铜镀金台,撒秘密佛一尊、呀吗达嘎佛一尊、上药王佛一尊、大轮手持金刚一尊、喜金刚一尊。钦此。佛五尊法身,连座通高三尺零六分。

于闰三月初五日接得旨意帖一件内开,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刘、和将章嘉胡土克图画得秘密佛纸样五张,交太监胡世杰转呈览。奉旨:秘密佛背光、莲座既用木做,法身亦不必用铜胎钹着木做庄严五彩。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到北京受文殊大皇帝尊崇》、第十一章《为文殊大皇帝宣讲佛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8、125-133页。

②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三章《到北京受文殊大皇帝尊崇》、第五章《受封为国师》、第六章《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进藏》、第七章《从班禅大师受具足戒》、第八章《受封为驻京掌印喇嘛》、第十一章《为文殊大皇帝宣讲佛法》、第十二章《莅临佑宁寺弘法》、第十四章《再次前往西藏弘扬佛法》、第十五章《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第十六章《剃度哲布尊丹巴出家》、第十七章《重回佑宁寺》、第二十一章《班禅大师进京陛见》,第19-28、45-93、125-149、171-227、273-284页;陈晓敏《清代驻京喇嘛研究》第三章《驻京喇嘛的活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61-85页。

③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第七章《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宗教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

④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⑤ 荷·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第九章《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5-348页。

⑥ (荷)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第3-443页。

钦此。^①

其中“库掌”系官职,为清代内务府所属营造司、掌关防内管领处、御茶膳房、御药房、养心殿造办处、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内火药库及武备院、奉宸苑稻田厂、圆明园等处之库、作所设掌库之官,负责掌管收储供备物料或器皿、内帑及营造、成做等事。库掌的品秩高低不一,有六品、六品衔、七品、七品衔及无品级数种,各视职事繁简大小分别给予。库掌之下设副库掌或委署库掌、库守等官。

此份档案显示最上楼的铜镀金台上供奉“秘密佛一尊、呀吗达嘎佛一尊、上药王佛一尊、大轮手持金刚一尊、喜金刚一尊”,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五大本尊: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和喜金刚。这份档案言“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刘、和将章嘉胡土克图画得秘密佛纸样五张,交太监胡世杰转呈览”,以此推之,最上楼所塑秘密佛之像当参照了章嘉胡土克图(即三世章嘉活佛)所画的五张秘密佛纸样。此再次证明章嘉·若必多吉与正觉寺及清朝皇室的密切关系。而且,按照制度规定,清代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和举行法会所需用度皆来自内务府^②。由正觉寺之例亦可看出内务府在管理国家宗教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六大金刚乃藏传佛教的重要神灵。《成府村志》细致描绘了最上楼的東西配殿所塑之六大金刚:

(最上楼的)东西尚有配殿各五间,每殿各塑三位人妖参坐的怪物,周身蔚蓝色,三头六臂,红发上冲,飘散空中。三目圆睁,獠牙生于上下唇外,手持人骨,碗内里放着人肉,正在嘴嚼人肉。紧围着脖项,系一串一串人头,摠想这些人头的肢体。他先已吞吃完了,将他们脑袋保存起来,作为战胜纪念品,表明他吃人数量很大。这位吃人的神祇,最受蒙藏人尊敬,呼为“六大金刚”。六只手均持武器,腰下系虎皮裙,肩上有赤蛇二条交绕胸前作为项圈,脖上挂着璎珞、垂珠及一切白虎皮条儿。下身六腿六足,周身无衣裤,□内塑着很大蓝色阳物,……上身后赤色火焰背光。该像东西配殿各塑三位。^③

这段记载同样表明作者不了解密教的教义,遂采用贬斥之辞来记述密教圆睁怒目之金刚像。在这里,手持武器、呈愤怒状的金刚神同样是为降妖除魔。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初六日油木作的一份档案显示:

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绮春园正觉寺匾四面、对四副,俱作双灯草线绵(锦)边璧子。其璧子随工成做,著造办处镶边托贴,随托钉挺钩倒环,先挑片金锦呈览。钦此。随挑得内库绿绫花锦二匹,葵花锦二匹,红片金二丈六寸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用。钦此。

于初八日,将做得锦边璧子、匾四面、对四副持赴正觉寺安挂讫。^④

由此可见,正觉寺的匾、对皆做璧子装饰。而且,璧子的用料、做工十分考究,并由负责皇家用度的造办处“镶边托贴”。清朝皇室对正觉寺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十二日《和珅等奏销算春雨轩赏趣殿等处园工银两摺》所附之《清单》又曰:

正觉寺檀城内铺设紫花灯笼锦、立绒毡一块,长二丈一尺八寸,宽一丈三尺二寸,周围黄布沿边,用过工料银一两八钱六分二厘。^⑤

此处的“檀城”即指“曼荼罗”、“曼陀罗”,又译为“坛城”,原为古印度婆罗门修密法之用,后引入佛教。佛教徒修行禅定之时,为防止魔众侵入,而划圆形、方形之区域,或建立土坛,有时亦于其上画佛、菩萨像,事毕像废,故一般将佛教徒所划圆形或方形之地域称为“曼荼罗”。佛教徒认为此区域内充满诸佛与菩萨,故亦称为“聚集”、“轮圆具足”。目前,笔者还未见关于正觉寺檀城的其他文字或图像材料,仅能据此份档案知晓该檀城内铺设紫花灯笼锦、立绒毡一块,周围黄布沿边。以是观之,该檀城的装饰也十分讲究。清代皇家园林(如清漪园、静宜园、避暑山庄)中建有不少藏传佛教寺庙,而曼陀罗宇宙观对其建筑布局、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1518页。

② 赖惠敏《清政府对北京藏传佛寺之财政支出及其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第17-24页。

③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6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1519-152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247页。

筑单体设计、室内陈设及装饰的影响既深且广^①。那么,作为藏传佛寺的圆明园正觉寺内筑有密宗修法的道场——檀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综合上文所论,圆明园正觉寺的陈设、布局及装饰充分体现着能工巧匠的构思、喇嘛教的内涵,用美轮美奂、庄严清净来形容,也不过分。这无疑是清朝皇室崇奉黄教、注重蒙藏事务的生动写照。

二、驻庙喇嘛及其佛事活动

正觉寺建成之后当然有喇嘛驻锡。除了前文所示最上楼里三世章嘉活佛的座位“罗汉床”外,最上楼之“东西有转角房,为喇嘛住所”^②。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的一份档案写道: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奏请新建正觉寺安设喇嘛住持焚修。奉旨:著由香山宝谛寺拨派达喇嘛一名,小喇嘛四十名,即于此内委署副达喇嘛二名住持焚修念经,即著伊等就近前往,在舍经堂焚香楼。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十三、三十日念经五次。钦此。^③

《成府村志》又云:

该庙(即圆明园正觉寺)最高僧官为达喇嘛,二为副达喇嘛,三为苏列喇嘛,四为得木奇,五为格司贵,六为锁呐奇,七为丈赞。该经卷用满文。圆明园正觉寺、万寿山之功德寺、香山宝提寺,共称为“满洲三处”。其经韵之声,以粗洪为最佳。其音乐之谱子为蒙古曲。^④

圆明园的正觉寺、万寿山之功德寺和香山的宝提寺被称为“满洲三处”,当指这三座寺庙的喇嘛全为

满人,念诵满文经卷,属于满洲喇嘛寺院。满洲喇嘛寺院是在清高宗本人的倡议下,由章嘉·若必多吉指导兴建的。清高宗不仅令满人出家当喇嘛,还组织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论疏译成满文,以满足其念诵经文的需要^⑤。正觉寺、功德寺和宝提寺的喇嘛用满文念诵喇嘛教经典,同时配以“蒙古曲”,足见清代满、蒙、藏文化之间的互融。

正觉寺的喇嘛配置亦参照清代典章制度。《清会典》曰:

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曰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扎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其次曰德木齐、曰格斯贵。其徒众曰格隆、曰班第。^⑥

《理藩院则例》规定:

京城各庙额设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缺、副扎萨克达喇嘛一缺、扎萨克喇嘛四缺、达喇嘛十四缺、副达喇嘛三缺、画佛副达喇嘛一缺、额设苏拉喇嘛十缺、教习苏拉喇嘛六缺、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缺、仓苏拉喇嘛九缺、公缺德木齐三十一缺、格斯贵五十缺。^⑦

包衣三旗额设达喇嘛三缺、副达喇嘛一缺、苏拉喇嘛三缺。……新正觉寺(即圆明园的正觉寺)达喇嘛一缺、苏拉喇嘛一缺。^⑧

《成府村志》所述“苏列喇嘛”当即《清会典》、《理藩院则例》所言“苏拉喇嘛”,前者所称“得木奇”当是后者所谓“德木齐”,前者所写“格司贵”当系后者所书“格斯贵”^⑨。依照制度规定,圆明园正觉寺“诵满洲经卷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缺出”,应在本庙“德木齐内按年陈公同遴选升用”^⑩。

根据上引档案材料的记载,每月初一、初八、十

① 参见张占生《普宁寺曼陀罗》,《紫禁城》1986年第1期,第48页;秦雷《清漪园中的曼陀罗坛城建筑治镜阁研究》,《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516-532页;李建红《简述外八庙殿堂内的曼陀罗》,《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58-160页;赵秀梅《承德普乐寺内的曼陀罗》,《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43-46页;等等。

②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6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1044页。

④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⑤ 王家鹏《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58-65页。

⑥ (清)官修《清会典》卷六七《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二,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20页。

⑦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六《喇嘛事例》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⑧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六《喇嘛事例》一,第275页。

⑨ 关于驻京喇嘛管理机构的建立、官员选拔、任命及调动,参见罗文华《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52-261页。

⑩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八《喇嘛事例》三,第321页。

三、十五和三十,正觉寺的喇嘛前往长春园内含经堂的焚香楼念经五次。焚香楼位于含经堂西配殿外侧,是一座两层转角佛楼。其布置和装饰带有浓郁的藏传佛教风格^①。藏传佛教通常视每月初一、初八、十三、十五、三十日为吉日。在这些天,藏人通常吃素、持斋或念经,以积功德。

《成府村志》追述正觉寺喇嘛的诵经活动:

看见这般喇嘛从事作法,用歌唱的声调,重复念那经文,对于其中的义意,却似乎丝毫没有领会。显然相信他们的效验,大上倚靠着重复念诵,想要将祷词一遍一遍连续着反复念诵。尽力所能,愈快愈好。又为念经者,感觉最少量的麻烦,以完成此事起见。^②

另外,有一个转轮藏安放在正觉寺的“最上楼前台明左边”^③。佛教徒认为转动转轮藏可获得和念经同样的功德。转轮藏也常常出现在喇嘛庙中。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的一份档案录有正觉寺喇嘛的俸禄标准:

三十九年三月奏准,正觉寺首领喇嘛二名,每月各行给公费银七钱二分,小喇嘛四十名,每月各行给公费银六钱六分。是年九月呈准,正觉寺喇嘛等照太监例,初次每名行给细布二匹,三线初布一匹,老羊皮七张,棉花八两。每逾五年一次,除羊皮、棉花不行外,每名各行给细布二匹,三线初布一匹。^④

依据前引《成府村志》所载,正觉寺的“最高僧官为达喇嘛”,当即这份档案所书“首领喇嘛”。

《理藩院则例》又规定:

正觉寺(小注:即新正觉寺),一两五钱钱粮喇嘛三十缺,德木齐一名,格斯贵一名,在一两五钱钱粮缺内。德木齐、格斯贵等随缺更役徒弟折色班第钱粮共二缺。(小注:此庙各项喇嘛,均系内务府三旗包衣额缺。)^⑤

显然,圆明园正觉寺的喇嘛均源自内务府三旗包衣^⑥。按照上引档案材料所述,“正觉寺喇嘛等照太监例”,也当指与内务府三旗包衣的情况相同。

正觉寺的喇嘛除了诵经,还需要做道场:

每年该庙(即圆明园正觉寺)有大道场两次。一为冬月二十五日,一为六月二十四日。每月初一、十五旗杆上升旗,大道场挂杏黄幡,正殿与后楼挂着一串一串的五色布旗,名岳“钟斯”。上有木印藏字。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祀关帝,由大喇嘛出帖请人大办善会。预备草席很丰,并不撒绸赚钱,人民入寺随便参观。赴会人带香一股。……赴席六位,一桌有知客招待来宾。喇嘛数十人上殿念经,吹打蒙古乐器。……每年冬月二十五日,亦是大道场之日。上殿念经,午后二时,全寺喇嘛排班打法器,绕大殿一周,然后休息。^⑦

据此视之,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祀关帝”之时,正觉寺的供奉之物十分丰盛,有几十名喇嘛念诵满文佛经,同时“吹打蒙古乐器”,此更是多元文化汇聚之集中表现。而且,民众还积极参与其中。这当与清朝统治者推崇关帝(即关羽)信仰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在清代,关帝信仰达到顶峰期。关帝的地位不断提高,清朝统治者将关帝奉为护法神、护国神,将祭祀关帝列入国家祀典,为中祀。清代宫廷、贵族家庭内普遍供奉关帝。国家还大力扶持和兴建关帝庙^⑧。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帝的生日,有些地区的民众在此日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⑨。在国家力量和民间信仰的作用下,关帝信仰也进入皇家的喇嘛庙正觉寺。冬月二十五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乃藏传佛教烟供火供之吉祥日。正觉寺在这天举行“大道场”,除了喇嘛上殿念经,还有午后二时全寺喇嘛排班敲打法器,并环绕大殿一周的活动,排场也不小。依据清朝制度,清代藏传佛教寺院举行法会所需用度皆

① 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第303页。

②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③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616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册,第1044页。

⑤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六《喇嘛事例》一,第283-284页。

⑥ 关于内务府三旗包衣的情况,详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第十三章《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1-75页。

⑦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6页。

⑧ 郑士有《关公信仰》第四章《关公信仰的历史发展轨迹》,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99-110页。

⑨ 郑士有《关公信仰》第五章《万古襄区皆庙祀,吟猿飞鹤满祠前》,第120页。

来自内务府^①。

三、兴黄教以安蒙藏

兴黄教以安蒙藏是清朝的既定国策。清朝皇室拨出巨资兴建正觉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成府村志》在描绘正觉寺的陈设、布置及喇嘛的佛事活动之后评论道:

北京城内外的喇嘛,均来自西藏或蒙古,脑袋剃得紧皮光亮,身穿闪闪发光黄色袍子。他一切设施,均直接由清帝庇护。京都附近所有他们的庙宇,全由皇家拨款建造。其中最重要的大庙宇乃建筑起来,作为大喇嘛、使臣驻节之所,当他每年进谒内庭的时候。此乃满洲政府通常的政策。对于居住中国本部喇嘛教的一切信徒,素宠惠特加的态度,借以联络喇嘛们所统辖的那般桀骜不驯的民族。……实际上长城以外北方那些区域,清帝实在的势力很小,但借着手段高超,善于怀柔远方,和威势赫赫、不可一世气概,名义上对于那些区域,能够保持一种统辖权,而且由大喇嘛派遣代表,每年朝见一次,进贡些许价值轻微的物品,足以表示他这种统辖权。公开承认一事,居然成功矣。^②

其中所云“由大喇嘛派遣代表,每年朝见一次,进贡些许价值轻微的物品”,实指“年班”制度。在清代,蒙藏喇嘛各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各一班于年节时轮流入京朝觐清帝,是谓“年班”。《成府村志》言“至十二月初八日,该庙(即圆明园正觉寺)达喇嘛同副达喇嘛入京,赴宫内中正殿该洞黎年班”^③。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全部由佛堂组成,是紫禁城内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④。此处的“洞

黎”指佛事结束,人们散去,满语指“吉祥”,俗谓之“送岁”。显然,正觉寺的僧官达喇嘛和副喇嘛在每年十二月需要前往京城中的紫禁城朝觐皇帝,行年班。按照惯例,清廷会给予前来觐见的喇嘛丰厚的赏赐。

清乾隆年间(1736-1795)正是官方大力出资在北京兴修藏传佛寺的时期^⑤。圆明园正觉寺的修建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上文所示正觉寺最上楼里放置章嘉活佛所坐之“罗汉床”,以及金勋的评论,充分阐释出清政府拨款兴建黄教寺庙对安抚和控制蒙古、西藏地区的重要作用。包括正觉寺在内的喇嘛庙皆体现出宗教空间与世俗政治交汇之特征,凸显出宗教和政治“纪念碑”色彩^⑥。苏发祥先生全面分析过清朝治理西藏的宗教政策,包括:扶植黄教、优渥喇嘛、喇嘛朝贡等^⑦。清朝兴黄教以安蒙藏,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册封和优渥黄教上层领袖人物,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和宗教地位,从而实现对蒙藏地方的统治^⑧。清朝依靠黄教的活佛阶层不但牢牢掌握了黄教势力,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蒙藏地方的“衙勒”,而且充分利用活佛这一特殊阶层的广泛号召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对蒙藏地方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⑨。尊崇喇嘛教以笼络西藏和蒙古、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是清朝的既定国策。这一政策的施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和统一的多族群国家^⑩。

(责任编辑:马胜利)

① 赖惠敏《清政府对北京藏传佛寺之财政支出及其意义》,第17-24页。

②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5页。

③ 金勋《成府村志》,上海书店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第29册,第616页。

④ 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官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第58-71页。

⑤ 赖惠敏《清政府对北京藏传佛寺之财政支出及其意义》,第7-12页。

⑥ 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纪念性”的阐释,参见(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182页。

⑦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第七章《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宗教政策》,第160-182页。

⑧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第七章《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宗教政策》,第161页。

⑨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第七章《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宗教政策》,第164页。

⑩ 商鸿逵《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辑,第109-113页;(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卫平译,雷颐审校《清代宫廷社会史》第七章《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在宫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328页。

The Intersection of Religion Space and Secular Politics: Test Zhengjue Temple in Yuanmingyuan Museum

YOU Li

(Yuanmingyuan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isplay, layout and decora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Temple—Zhengjue Temple in Qing Royal garden—Yuanmingyuan based on deducing documentary materials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local chronicles—*Chengfucunzh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per interprets its religion connotation, and expounds Lama in this temple and their Buddhist activities. Then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this templ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ourt and Mongol and Tibet, and consolidating the unified nation of multi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Yuanmingyuan; Zhengjue Temple; Tibetan Buddhism

(上接第 29 页)

Towards the Experiential Grammar of “chi” in Modern Chinese

XIANG Da-jun

(Normal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olds that grammar is a theory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lexis is most delicate grammar. 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tial structure of “chi” and its collocations with the linguistic data from three Chinese corpus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esides being used as a verb to realize a Process, “chi”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and an adjective to realize Thing and Quality, which can play different participant roles in different processes. The collocational and meaning potential of “chi” in modern Chinese reveals that it is a complex human experience.

Key words: “chi”; experiential grammar; Thing; Quality; Process